

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启示

蒋海曦¹, 王照涵², 蒋南平²

(1.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100年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不少挫折,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成绩斐然。这一段伟大的历程,对我们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开拓创新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100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化; 启示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1)06-0018-10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既包括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涵义,又包括通过中国革命及建设,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形成具有普遍意义、世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涵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中一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从而进一步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这两者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和现实联系,两者相辅相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奔向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坚持正确的方法和思想路线十分重要。

[收稿日期] 2021-06-30

[基金项目] 202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专项项目”(项目号:SC21JD009);2021年西南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贫困治理战略研究”(项目号:220210004005040390);2021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年贡献”(项目号:020210005002040007)。

[作者简介] 蒋海曦(1984—),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理论。

王照涵(1993—),男,河南郑州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蒋南平(1956—),男,四川中江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之路

“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规律去思考去行动。这条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检验、不断证明其真理性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他们通过团结影响一批先进人士,创办刊物等,形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当时,毛泽东成立的新民学会,也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1920年5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而毛泽东对新民学会等会社的看法是“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2]在这个时期,早期先进人物及组织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必然遵循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认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输入马克思主义”,^[3]因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4]在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并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工农必须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

这一时期的早期中国先进分子作出了如下贡献:形成了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思维的启蒙氛围,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开启了思想之门,形成了“民主”“科学”的风气,为人们认识从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传播,为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使其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初步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大方向在于摒弃资本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中国的社会进步;指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实行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跳跃进化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中国式道路的前提条件;初步提出了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应大力发展经济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设想具体方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条件限制,最初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更没有“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故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还没能制定出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相关政策。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形成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土地革命制度。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5]因此,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中心课题提了出来。但当时的领导人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只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主张,这种盲目性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时的领导人又一次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地主资本家不加区别一律打倒。甚至认为“店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小商人,已经不是革命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如果他们怠工闭厂,“便没收他的工厂”。^①这种政策,给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如当时海陆丰根据地除了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外,还取消一切高利贷和债务,共烧毁田契40.1088万张,租账5.802万本。^②“连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③以致“使中农小资产阶级背离革命而脱离土地革命路线,使贫农及无产阶级处于孤立的地位,至于失败”。^④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井冈山根据地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对推动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⑤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开始纠正以前的偏差。于是,在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同年7月,又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推进了一大步。尽管在实施这些法案时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干扰,但毛泽东于1930年2月,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赣南特委、红五军及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并于1930年3月15日颁布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⑥1930年10月,这个地区30余个县均完成土地分配任务,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又一实践成果。1933年,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苏区的查田运动,并在同年6月17日至21日的中央苏区的县区以上负责人大会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纠正了当时在分配土地过程中不实事求是的一些作法。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鉴于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激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情况,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新判断,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和策略。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6年1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又作出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都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的新的政策调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条件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将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在农业方面,组织互助组,发展合作运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安心生产;在工商业方面,则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税收外流,保持商人的正当利益。同时,还进一步发展了公营经济。这样,边区的经济有了很好地发展,有力地保证了边区军民抗战的需要。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具体的实践路径则有所区别。例如晋察冀边区,1940年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在冀中根据地,则将合理负担进一步改为统一累进税。这进一步使一些具有较多其他收入的地主富农更加合理地负担税赋,同时也避免“左”的做法,以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对此,毛泽东总结为,“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当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全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6]764}

在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保护工商业等基础上,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除减租减息外,也规定要交租交息;规定保留永佃权或长期租佃契约。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临时中央政治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② 绮园: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一九二八年十月)。

③ 《一九二七年的海陆丰运动》,载《布尔塞维克》第八期。

④ 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王首道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⑤ 中共中央第三十七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日送到井冈山,六日,湘赣特委召开三十余人会议进行讨论。

⑥ 中共赣西南特委向省委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六月)。

针对一些地方的复杂情况,在1944年至1945年间,各根据地又普遍开展“查减运动”,既对一些不法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和保佃的运动,又纠正了不交租不交息的倾向。而各根据地在1941年至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更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果的运用。这一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具体体现在下列方面:其一,把发展公营及民营经济作为保证财政及供应的根本办法及措施;其二,把组织生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中心环节;其三,倡导自给生产运动;其四,积极反对忽视生产的观点。由于这一时期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政策,故而必然取得很好效果。陕甘宁边区在1943年做到了经济上完全自给。甚至过去边区不产棉花,1945年则有棉田35万亩。其它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如1944年,部队的给养已基本自足,仅新四军直属部队在1944年的一年生产总值就达1500万元以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我党领导的边区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成果。

抗日战争结束后,从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然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积累的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在解放区,除了继续实施土地政策外,我党已形成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济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认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6]678}而在农村,则应扫除封建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6]671-672}这个经济纲领,不仅在解放区试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适应了解放全中国的需要,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打下了理论及实践基础。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中国实践

显然,从这一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经历来看,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形成,是经历了千难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也才逐渐成为全党遵循的思想路线。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国情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是否能够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新现象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后,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新的重大课题。这个重大课题具体表现为:一是怎样形成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制度环境;二是怎样解决中国当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问题;三是实行怎样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四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形式进行经济建设;五是怎样对待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商品经济范畴;六是怎样选择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七是建立怎样一种社会产品分配制度;八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的社会及自然的矛盾问题。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更多的经验可参考,前苏联的作法是我们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寻找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要依据。然而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及给于中国的经验,本身就存在许多误区,这使得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经济建设的工作及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遇到不少阻碍及曲折。尽管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有许多正确的实践,如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建立起符合当时国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但在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及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处理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社会产品分配方

面却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领导的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已具有对敌占区贸易、运用货币、进行商品生产流通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用行政手段管控混乱的市场和物价之外,还利用经济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特别是在“一化三改造”中,我们仍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并通过供销关系将小生产者联系及组织起来,打下了合作化的基础。这都是客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及市场”理论,并将其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以后,依据苏联模式形成的计划经济,改变了这种状况,我国经济尽管也取得了成绩,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促使我们进行以后的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就实事求是地认为,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一种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特别是“一化三改造”后的1957年,毛泽东更是客观地认识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7]375}“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主要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7]357}还特别告诫全党要特别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多种情况。但后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我们曾一度失去了客观判断事物的依据,一度出现了“打击面广”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社会矛盾开始尖锐。而人与自然的關係也因脱离实际的经济“赶超”速度而恶化,生态环境开始严重变差。至于新中国的分配制度,最初也是多元的,也保留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形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便在公有制企业等经济单位,“按劳分配”的情况也不相同。例如在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干同样工作,报酬差别就很明显。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物资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谓绝对平均”。然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脱离中国实际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也无法贯彻。

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来看,在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新的途径。其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新的形势下,形成新的成果。所以,鉴于上述原因,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重新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开始谱写新的篇章。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更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分别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制度保障、科学发展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使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成绩更为显著。这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四个全面”,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客观地对国际国内局势进行分析,明确指出“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8]于是,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措施、战略及实施步骤、明确了工作的着力点,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故而,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即便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考验及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同时取得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在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巨大成就,为建成现代化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之果。

党的100年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程,再次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科学性,真理性,故而,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下去。

三、历史的实证: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需要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需要真正地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解中国的实际,并要保证两者结合的正确性。故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方法,也成为形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形式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竞争与垄断信用理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理论等等,当然还有诸如补充性货币理论,生产力理论等等,它们都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这些内容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既需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又需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要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透彻全面的了解。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有生动具体的中国特色,其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都会表现中国国情的特性。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应根据中国特点加以运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对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但在实事求是认识国情问题上却有重大失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曾评价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9]邓小平也曾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0]而能真正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思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注意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了解,并针砭时弊为人民鼓与呼。他在湖南创办了“新民学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创办了《湘江评论》,与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研究讨论当时中国的问题。由于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所有制改革,这项工作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实践。当时,在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对待富农、如何对待地主家属等问题上,情况复杂,意见不统一,亦受到共产国际的干涉。这些阻力的形成,主要是当时的一些人,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完全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故而也无法做到实事求是所致。而毛泽东为使工农大众认识革命的任务、目标,特别是为了分清革命的对象、同盟者及主力军,深入农村、厂矿进行考察、写下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正确分析了中国国情,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土地革命中,针对当时苏区中分田分地出现的偏差及错误,毛泽东在经过了一系列调查后,又分别写出了《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多份调查报告,正确地回答了土地革命中的许多具体的政策问题。社会调查中,毛泽东对各种情况考证得十分认真及准确。如他在对湘赣边界各县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进行

调查后得出了详细数据:“遂川占80%,永新占70%,万安占60%;莲花占60%;醴陵占70%;永新县占70%”。^①正是在这种数据基础上,才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出新的土地改革规定。^②为了在严酷环境下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毛泽东于1933年12月对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以了解实情,写下《长冈乡调查》一文,盛赞长冈乡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到很大的成效”。^③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写出的调查报告,许多直接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或思想成果,从而成为指导实践走向成功的基础。例如,毛泽东通过对当时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实地了解,写出《才溪乡调查》,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大数量的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励,废除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忠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④可以认为,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得益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事求是的调研考察,以事实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清楚地了解国情的得出实事求是的成果。毛泽东曾回忆到:“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以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⑤

在抗日战争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根据调查的事实,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调整了实行没收和分配的政策,形成了新的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事求是的政策,这样“政策成为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11]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又实事求是地适时调整政策,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取得了大生产运动胜利,进而为抗日战争胜利形成了重要条件。面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同样在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方针,从而促成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又同样面临如何清楚认识中国的国情,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一步推进的问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6]651-65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一化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主要表现于:其一,迅速地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其二,通过推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其三,通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形式的形成;其四,迅速建立了具有较为合理的区域布局、比例协调的新中国产业,促进了中国区域经

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②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④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⑤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济的发展;其五,迅速提高了经济效益,大力降低了能源消耗并扩大能源生产,显示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性;其六,极大地壮大了全国职工队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福利,激发了他们的经济建设热情,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其七,促进了以工业技术为代表的社会技术的进步,使中国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上升;其八,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提升了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但是,也应看到,在这期间,面对新的不断变化的形势,我们有时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同实际的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导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法认真贯彻,我们对中国自身的情况,有时还认识不清楚,导致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还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的境地。^[12]究其原因,主要有列方面。其一,在认识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发展阶段理论,未能认真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存在偏差。这主要应归于苏联领导人及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方面的误导。由于认为有了相关经验,我们就可以照搬照抄,故而既没有理论联系实际,更没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将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实行计划体制,但其前提是生产力要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其生产力并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故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其二,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关系及相应体制方面的问题也认识不足,这也是没有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及实事求是的表现。由于没有现存经验,苏联经济理论的误导以及把苏联前期的成功做法归结为普遍适用的苏联模式,使得我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搞单一的公有制及纯粹的按劳分配就是必然的。即便存在落后的生产力,也认为是由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其三,在实践上违反规律地人为排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实际上同样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领导下的苏区、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已经为适应战争需要,发展起了一定的商品经济。至1956年,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十分活跃。“一化三改造”之后,由于对国情认识的偏差,通过“统购统销”,以及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主体不复存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社会主义有商品货币、没有商品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不再起作用”的理论实践误区。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完全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搞好各项工作,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四、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结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了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认为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于这种实际,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及实践成果。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党的建设、以整顿党的作风推动经济建设,结合中国的实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我党进一步正确地认识到中国国情是“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新时代,应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8]有了这种认识,使得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好地结合于新时代中国真实的实际之中,进一步取得精准扶贫、战胜疫情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理论联系实际及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百年结晶。要真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除了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实际之外,仍然要将两者正确的联系或结合起来。100年来,中

国共产党为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早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当时个别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倾向,于1930年5月,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理论与实际如何正确地进行结合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必须要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本本是需要的,但一定要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1938年10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分析到,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应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们。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经过中国土壤中的民族性元素来表现,才能有用处。1941年5月,毛泽东更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一定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去找立场,找观点和找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要正确运用中国实际的重要性。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是对立统一的,这就是辩证法。这清楚地说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正确地与中国实际结合,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如何正确地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样作了很好的阐释。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中进一步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即完成具体到抽象的理论上的飞跃。他在1956年11月发表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指出,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经验,会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能实现。以后,他又多次谈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于实际的问题。“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会取得成功”,^{[13]2}“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否则会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3]292}在面对中国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之际,有两种模式的抉择。鉴于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因此改变苏联模式势在必行。因此,邓小平认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4]而西方模式,也有许多缺陷。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认为,“西方模式中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15]因此,我们搞市场经济,“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15]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科学发展观”成为正确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起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而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共“十八大”及“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在新时代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新发展理念”以及一系列领导人民奔向现代化目标的方针政策,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形成了正确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成果,并继续形成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新的实践成果。事实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胜利保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结晶。

[参 考 文 献]

[1] 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2.

- [2] 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3.
- [3]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77.
- [4]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74.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5.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4.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75.
- [8] 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4.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3.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1.
- [12] 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77—8—12(1).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6.

(责任编辑:闫卫平)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ory to Practice: The Ed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JIANG Hai-xi¹, WANG Zhao-han², JIANG Nan-ping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2.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 al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many setback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great journey is edifying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modern country. We must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e sure the people-centered mass line continues to be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Marxist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00-year; Marxist economics; Sinicization; edification